

亮点与问题

——2011年短篇小说综述

□段崇轩

探究人性的优秀之作

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灵活、精粹的艺术文体，更容易进入人们精神灵魂的“内宇宙”。近年来表现人的情感精神的短篇小说大量增加，且涌现了大批力作和精品。这类小说，一面揭示大变革时期人情人性的变异和走向，一面用现代思想观念给予审视和剖析，表现了一种可贵的精英立场和意识。但同时也要看到，在写人性、欲望的旗号下，那种低俗的、丑陋的东西也乘虚而入，先是在中篇小说上蔓延，现在又向短篇小说渗透，这是需要格外警惕的。

人性是一个神秘莫测而难以把握的世界，揭示人性的奥秘始终是作家乐于挑战的课题。表现人性所达到的高度，也标志着作家思想和艺术的高度。在2011年的短篇小说中，我们读到了几篇探究人性的优秀之作。赵本夫的《临界》既是一篇心理小说，也是一篇哲理小说。主人公四毛为了对得起父亲的信任和自己的良心，长期坚持做好人好事，却屡屡被冤、被抓、受辱。众口铄金、善有恶报，四毛的心理和精神终于崩溃，决心去做一回坏人坏事，毁掉了他一生的形象和信念。小说蕴含着的一个深刻的人性和社会主题：在一个好得不分的社会环境中，做好人是艰难的，当他的善长期得不到认同甚至被误解时，人性之善就会转变为人性之恶。马晓丽的《杀猪的女兵》探索的是更纯粹的人性变异：一个柔弱和善良的女子在长期的杀猪生涯中，被扭曲了人性，最后竟杀死了自己的丈夫。“恶”的种子一旦播下，在特定的环境中，就会突然萌发。邓一光写城市人的精神世界比起写农民工的生存状态，显得更为得心应手。《深圳在北纬22° 27' -22° 52' 》描写的是对白领夫妻疲于奔命的日常工作 and 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，现代都市使他们丧失了人的感觉、乐趣和思想，他们只有在梦中，才能实现人性向自然的回归；男人变成飞奔的野马，女人变成飞舞的蝴蝶。三篇作品，题材新颖、构思精巧、主题锐利，是难得的佳品。

在表现婚姻题材的小说中，都市故事占了很大比重，且大多写的都是婚姻的迷失、交易和破裂，由此可见都市人情感精神危机之严重。罗伟章的《细浪》以中年女王燕做隆鼻美容术为“窗口”，撩开了成功人士的心理情感一角，她们向往年轻和美丽，但人造的容貌却让她们厌弃。钟求是的《皈依》写的是现代家庭的女妻，在享受了太多的锦衣玉食，走过了漫长的婚姻之路后，对清心寡欲的佛教境界的“皈依”。盛京的《像植物一样活》表现了现代女性对婚姻家庭更决绝的反叛。她们对美满的婚姻、富裕的家庭已不再留恋，她们厌倦、恐惧琐碎而庸俗的婚姻生活，因而离婚出走，“拒绝做动物，拒绝欲望”，要“活得像植物一样，芬芳、洁净、蓬勃”。在现代都市，物质生存已逐渐不是问题，而精神生活却困境重重，这些小说给读者一种新的启发和思考。

在叙述家庭故事的作品中，金仁顺的《梧桐》和滕肖澜的《天堂再见》是两篇值得称道的优秀作品。前一篇作家描绘了一幅逼真、鲜活、带有市井韵味的家庭生活图画，从各种人物的精神情感以及相互交往中，捕捉到尘世中最珍贵的亲情和爱情，给庸常、黯淡的日常生活注入一脉温暖的亲情。《天堂再见》的作者则深入到了一个严酷的生命和伦理主题中，让一个柔弱、贤惠的妻子去实施残废丈夫的“安乐死”。在家庭的毁灭、丈夫的剧痛中，这位妻子作出了无畏的选择，并用

■新作快评

王昕朋《村长秘书》，《朔方》2011年12期

过尽千帆皆不是

□潘德宝

王昕朋的《村长秘书》叙事之工，颇具曲径通幽之妙。小说不以全知视角叙述，没有一开始就和盘托出、直奔主题、切中命意。

小说开篇，主人公大学生村官杨东东跟着村民刘小芹入村赴任，而刘小芹却以为是流氓尾随，手持砖头以防万一。青年男女闹了一点小误会，颇有心理张力与喜剧效果。也许有读者会误以为这是乡村爱情小说，因为开头往往就定下了小说的基调，但是这篇小说并非如此，这就有引人入胜之功了。

待得大学生村官见了村主任，乌烟瘴气之中，被任命为村长秘书。这里又是恶狗，又是恶官，可以理解成乡村干部的另一类下马威：这是对异乡人进入乡村权力层的警惕。这令大学生村官颇为不满，准备要向上级镇委员汇报。根据阅读经验，读者也许会误以为小说是描写村与镇之间的权力之争，但是小说也非如此，这就颇启人疑窦了。

再等到大学生村官在山花烂漫中见了村支书，颇有一番如沐春风之感。老支书交待了全村情况以及全村发展的矛盾所在。大学生村官很有一番壮志，似乎想要用自己的学识，让落后的山村脱贫致富。但是，读完小说之后，这种印象也并不会全面。

直到小说故事的高潮，才让读者感觉抓住了主题。民全村村主任要求全部村民种烟叶，因为村民抗命不遵，村主任叔侄二人便用了推土机来铲平麦田。这时小说中预埋的伏笔一齐都活了过来。小说开头刘小芹担心自己家里的麦子长腿“跑了”，实是事出有因：村民随身携带一根棍子，原来就是为了提防村主任家的恶狗；而村主任家名其恶狗为“二聋子”——就是刘小芹父亲刘平安的外号，也说明了两派的争斗其来有自。这如同明清小说评点所谓的“草蛇灰线、伏脉千里”，正如金圣叹所说：“骤看之，有如无物，及至细寻，其中便有一条线索，拽之通体皆动。”这种“草蛇灰线”就是上下勾连，让小说形成有机的整体。这种理解应该能探骊得珠了。

而且，村民们为了保卫自己的麦田挺身而出，不惜以肉

体阻挡巨大的机器，包括权力机器，暴力冲突暂时平息之后，马上有了余波。因为冲突中村主任一方稍占上风，小说就在余波中寻找平衡，让村主任一方稍稍落后。同时，又将场景换到了村主任家，刘小芹与村主任女儿的对骂，厮打中“刘小芹雪白的乳房和粉红的乳头暴露在众人面前”，这使小说故事更符合农村的特定叙事空间，符合读者对这一题材的心理期待。从叙事学角度看，这也正如金圣叹所说的：“獭尾法：谓一段大文字之后，不好寂然便住，更作余波荡漾之。”这让整篇小说更有了有机特性。村霸与村民之间的矛盾、基层权力的运作、乡村血缘政治模式，无一不是时代的主题，小说细嚼暗花，终于定格在这些主题之中了。

但细品之下，似乎感觉作者用心所在又不仅止于此。真有“过尽千帆皆不是”的叙事乐趣。因为小说解决村民矛盾的方法就在大学生村官杨东东身上，小说中也早有“草蛇灰线”，当村主任问起他的父亲，杨东东简单地交待了其父是个生意人。铲平的麦田如何处理？杨东东建议种上“铁棍山药”，但村民们心存疑虑，最后杨东东搬出大老板的父亲来包销，顺利平息村民的矛盾。

这也许可看做是作者借刀斩乱麻，迅速结束故事，以大团圆结局。但是，这种理解似乎仍是买椟还珠，未得小说真谛。

因为作为个案，也许真有大学生村官的父亲帮助了农民的生产与农产品的销售。但试问所有的大学生村官都有这样一个父亲吗？我以为，用这个办法来解决民全村的矛盾，其实可以称为曲笔。鲁迅在小说《药》中，为主人公夏瑜的坟上“平空添了一个花环”，在《明天》里单四嫂子里竟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。鲁迅自承这是曲笔；为凄凉的故事，加一个不消极的结尾。王昕朋这篇小说中的这一手法，何尝不可以这么看呢？

因为小说故事结束之后，还有一个长长的尾声。这个尾声从叙事学角度看，不只是故事层面上的尾声，而且是叙事话语层面上的真正高潮。小说叙事的“过尽千帆皆不是”，至此终于显出“斜晖脉脉水悠悠”那般令人一唱三叹的艺术魅力。正是这一有思想力度的尾声，会让读者从阅读的乐趣，深入到严肃的思考。

小说的尾声中，民全村换上了新的村主任刘福——就是小说一开头骑自行车带了杨东东几里地就要收钱的家伙，这也算是“草蛇灰线”——他也同前主任一样，开始偷伐树木，中饱私囊了。大学生村官作为外在机制，作者以曲笔表达了光明的期待；而这个尾声影射出曲笔的意义：农村的自我更新、自我发展之路在何方？作者的隐忧在老支书那里获得舒展；凡做事看老百姓支持不支持……这不正是小说的叙事空间“民全村”（“民全”谐音“民权”）的意义所在吗？

“同归于尽”的方式完成了两个年轻生命的“涅槃”。

在表现情感精神世界的短篇小说中，既有格调高雅的优秀作品，也有部分粗制滥造的低俗之作。譬如一些描写多角恋、一夜情、婚外恋的作品，一味渲染性和欲望，损害着短篇小说的典雅品格，这种倾向是应当注意的。

人物塑造的成就与不足

现在短篇小说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以为是人物塑造的问题。读过一两百篇作品，那种鲜活、新颖、有深度的人物形象很难遇到几个。有些人物形象，要么是模糊的影子，要么是理念的木偶，很难留下深刻印象。短篇小说人物淡出的问题已受到众多作家和评论家的关注，但多年来并没有得到扭转。这正是短篇小说难以重振的重要原因。

在2011年的短篇小说中，我们也看到了作家在人物塑造上的努力。尽管鲜明而结实的人物不是很多，但也有一批。对于短篇小说，虽然不能要求都去写性格化、典型化的人物，但文学史实践证明，短篇小说完全可以写出杰出的典型人物，这样的形象在今天依然有强劲的生命力。关仁山《镜子前的打碗花》可谓一篇精心塑造人物的现实主义力作。农民工形象在当下的短篇小说中比比皆是，但一般写得较为单薄、清浅，正面品格着笔较多，负面性格浅尝辄止。而关仁山笔下的农民工，不仅显示了作为农民的优秀品格，更揭示了身为农民的卑劣品行。主人公张五可，在短短几年时间中，身份逐渐转换，从蹬三轮车的勤劳善良的农民工，到生活悠闲、妄自尊大的富豪的看门人，到偷偷物又骗色的盗窃者，最后又回到辛苦而卑微的三轮车夫。勤劳、善良、聪明以及自私、贪婪、狡诈、虚荣等性格和品性，既矛盾又统一地凝聚在张五可这个人物身上，而聪明、大胆、执著是他作为底层人物的核心性格。这一形象的社会内涵和审美价值是值得充分肯定的。

短篇小说中的人物，除了现实主义的性格化人物外，还有赋予诗意的意象化人物，突出某种性格的类型化人物，着力刻画一种心理、精神的心理型人物、象征型人物等等。其人物塑造的天地是非常广阔的。李浩的《爷爷的“债务”》描绘了一位忠厚仁义、执拗践诺的爷爷的形象，但作家又对这种传统品格给予了形象的解构，使这一形象变得丰富而复杂起来。温亚军的《麦子》刻画了一位爱麦子如命、对世事怀有忧患感的大舅的独特形象，同当下那些忘却饥荒灾难、沉湎世俗享受的人们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还有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人物形象，如甫跃辉《秋熟》中的老龙太、翠妮祖孙俩，在古朴、丰饶的乡村秋景中，一老一少两个人物竟显得那样美好而凝重，他们的善良、淳朴反衬了世人的卑俗和虚伪。再如马金莲《鲜花与蛇》里的农村少妇阿雪，小说在琐细平淡的农家生活画面上，呈现出一位勤劳、质朴、贤惠的传统女性形象。又如万玛才旦《鸟金的声音》中的少年活佛鸟金，在“我”的眼里和心里，褪去了神秘色彩，闪烁着美好的人情和人性。

也许是惑于当下小说人物的薄弱和造作之弊端，有些作家开始探索纪实小说，塑造写实人物，有人称之为“非虚构文学”。邵丽就是在这条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的青年作家。她的《挂旗笔记》记叙的是作家在河南某县挂职副书记时所

■短 评

优美而智慧地书写城市

□蔡 东

信息——像关于深圳的一场场梦，具有形而上的色彩、多重解读的不确定性、宽广的阐释空间和无法言尽的复杂意味。同样反映住房之痛，《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》与《蜗居》的艺术品格迥然不同，前者兼具问题意识与美学功能，以出世的笔法来做入世的小说，形式别致而精美，与现实意脉相连，又灵巧地飞离了现实，像一颗沉潜在时间深处的祖母绿，光华内敛。

轻盈跳脱的叙述、身份不详的人物、敞开的结尾，使上述小说喷薄出一股不受约束的狂野气。邓一光对小说的理解是通透的，也是深刻的。他反叛平庸的艺术形式和笨拙的现实主义，当讲述蔚然成风，作家们令小说肥大臃肿、不堪回味时，他更懂得舍弃和留白，用幻觉和梦境点染城市，用象征和隐喻影射现实，形成一种真幻掺杂、虚实相生的文本质地。他又似乎具备特殊的异能，能与植物、水鸟、昆虫进行隐秘的交流，作品里弥漫着物我交融、接通天地般的梦幻、超逸和辽阔。

城市书写有相当的创作风险，因读者太熟悉，对素材的处理更强调慧心和才情。邓一光兼有丰厚的阅历、天赋的艺术感觉、稳定的小说技巧和成熟的社会人格，已齐备了书写都市并构建一座审美世界的素养。

人们常有先入之见，认为深圳的文学素材并不丰饶。事实上，即使放诸世界范围，它也是一座独特的城市。人们从内地南迁至此，身心往往受到剧烈冲击，这就具备了强烈的文学性。在这里，邓一光呈现出喷发式的创作状态，原来此地的文学材料如此富足，美玉如斯，可堪琢磨，遍地小说，火花四溅。邓一光于深圳文学界的意义，不是名望、领军之类，而是具体创作上的启发和开示。写得浮泛，写得陈旧，写得滥俗，罪不在城市。新城的文学内蕴不足，但这里的创作资源并不匮乏，匮乏的是提取能力、艺术识见、思考力度和开拓书写空间的勇气。

熟悉的几个人物：副书记祁福旺、小车司机刘三召、政府食堂大师傅王三炳。人物性格的鲜明，生活细节的有趣，裹挟着人间的烟火和现实的“生猛”扑面而来。《老革命周春江》塑造了一位逼真、坚实而丰满的县委副书记形象。他没有文化，思想守旧，但资历深，工作认真，廉洁刚正。因离退休问题解决不当，他怨气很大，多次上访；但他对党、对革命忠贞不二，为当下的社会问题忧心忡忡。一个质朴、赤诚、执拗而又狭隘、盲目、愚忠的老革命形象跃然纸上。只有在生活的泥土深处才能发掘出这样的人物来，只有用纪实的手法才能雕塑出这样的形象来。这样的人物形象具有原创意义。但另一方面，由于作者过分粘滞于生活原型，使这一人物缺乏艺术形象应有的纯粹与和谐，难以达到典型的高度。

历史题材的发展

短篇小说不仅擅长描写现实生活，同时适宜书写历史生活，表现历史题材。上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也不时出现一些历史题材作品，但数量较少，构不成阵容。2011年我们欣喜地发现，历史题材在潜滋暗长，数量在增加，质量也在提升。历史题材的发展，显示了短篇小说表现领域的扩展和作家艺术视野的开放。聂鑫森、孙方友、谈歌等人在这一领域卓有成就，不断有新作问世。现在又有一批作家在跟进，且显示了新的创作特色、艺术生机。诚然，当下的历史题材短篇小说，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，譬如取材还不够开阔、多样，思想观念还不够新颖、深刻，还需要不断提高。

古代历史题材，由于时代久远、生活隔膜，在创作上有相当难度。只有那些熟悉某一时期、某一领域生活的作家，在短篇小说艺术上已有一定造诣，才可能写出高质量的作品来。叶广岑出身满族，是叶赫那拉氏后裔，不仅对清王室家族生活有深广的了解，而且有与生俱来的情感渊源，因此创作了众多古色古香的家族系列小说。2011年的《后罩楼》就是一篇出类拔萃的艺术精品。作品描述的是清王府后花园的故事及瑄格格、奶妈黄老婆子的生活，并没有定格在已逝的清代，可能是一路扫描了这座花园和这些人，从清朝、民国、新中国特别到“文革”时期的遭遇和变迁。故事扑朔迷离、引人入胜，作者反思尖锐、思想深刻。

中国现代历史，充满了腥风血雨和革命、战争，其实也是一座文学的富矿。葛水平的《第三朵浪花》和鲍十的《东北平原写生》，都表现了20世纪40年代的土改运动，是现代历史题材上的突破。

中国的当代历史已有60余年，新时期之前的近30年，也可视为历史。2011年我们看到了多篇描述上世纪60年代生活作品，虽然大抵是一些日常生活的“小叙事”，但依然有着特别的思想和审美价值。迟子建的《七十年代的四季歌》以童年回忆的方式，叙述了原始、贫困、杂乱的历史背景下，“我”自由、快乐的儿时岁月，温暖、丰富的底层社会生活，以及有着勤劳、善良、正直品格并敢于抗争的老一辈人形象。荒凉的历史时代，竟有着缕缕温馨的记忆。毕飞宇的《一九七五年的春节》同样把画面锁定在童年记忆上，那位既“高贵”又“倒霉”的县宣传队名演员，她悲切而怪异的神情举止，她给乡村女孩化妆时的痴迷忘我举动，她在召唤阿花时失足落入冰窟窿中的挣扎与“舞蹈”，都给“我”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，也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思考。